



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編纂委員會

主任 王鶴鳴 馬遠良

副主任 王世偉

委員（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世偉 王勤 王翠蘭 王鶴鳴

任光亮 沈麗全 侯怡敏 夏穎

馬遠良 梁穎 陳先行 陳秉仁

陳建華 郭立暄 葉寶弟 顧文韻

顧雅芳

執行主編 王世偉 陳先行

副主編 郭立暄 侯怡敏

圖版攝影 葉寶弟

# 前言

陳先行

《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屬近年來上海圖書館陸續整理出版的館藏精選系列之一。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們想談一下對古籍版本學、版本圖錄在版本學中所處的地位以及編纂此書的意義的粗淺認識，並介紹一下此書的編纂經過。

## 一、古籍版本學的主要功用與特徵

古籍版本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它主要以客觀存在的各種古籍版本為研究對象，根據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徵與異同，鑒別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包括考訂版本源流，評估版本的文物價值），為人們解決閱讀、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問題。當然，研究版本學本身的發生、發展及其與相關學科的關係等亦屬於版本學的範疇，但離開鑒別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為古籍版本學。

鑒別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既是古籍版本學的主要功用，又是古籍版本學區別於校勘、目錄等相關學科或者說是從這些相關學科中脫離出來獨立成學的主要特徵。鑒別版本真偽或許要借助校勘手段，但校勘學的主要任務是發現並糾正書籍的文字訛誤而不解決鑒別版本真偽問題。誠然，通過校勘也會起到揭示版本優劣的作用，但古籍版本學的區分版本優劣還包括評估版本的文物價值，這同樣不是校勘學所承擔的任務。而傳統的目錄學，通俗地講，主要任務是解決如何對圖書進行著錄、分類與編目的問題，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古籍版本學

的功用有着明顯區別。古籍版本學對各種版本研究的成果往往會通過目錄來反映，同樣，目錄學要充分揭示圖書的全貌亦必須利用版本學的研究成果，於是產生了所謂的『版本目錄』，但這只是兩者相互結合利用的關係，而不是相互隸屬的關係，更何況傳統目錄學的成學在兩漢，而具有鑒定考訂版本性質的版本目錄的成熟、發展要晚至清代。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漢代劉向整理國家藏書，雖以備列衆本爲前提，校異同，刪重復，訂訛誤，最終撰成敘錄，但這些工作更接近於校勘學，與鑒別版本真偽無涉。之後，其子劉歆纂成《七略》，則又屬於目錄學的範圍。宋代雕版印刷興盛，『版本』或『善本』的名詞已頻繁出現，但這也並不意味着版本學已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宋代『善本』的概念主要指文字無訛，屬於校勘學範疇，而清代以後『善本』的概念已擴大至具有文物價值的內涵，爲版本學所習用）。無論著者有爭議的《九經三傳沿革例》（舊題宋岳珂編，張政烺等先生考定爲元初岳浚編）抑或尤袤的《遂初堂書目》，雖亦備列衆本，但前者做的是校勘工作，後者做的是編目工作。即便是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雖然間或對版本類型與刻印的時間、地點、刻印者甚至版式等作疏簡的記錄，但陳氏並非有意識地在做鑒別版本工作，而且在客觀上也不存在這種必要，因此該目錄只能說是一部提要目錄而不是版本目錄。

古籍版本出現作偽及如何鑒定版本真偽問題的提出，據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分析，當在明代中後期（圖書作偽的現象在漢代已經出現，但在相當長的時期裏，作偽的對象主要是『書』而不是『本』）。因爲在那時，隨着宋、元舊本的日見稀少，其文物與文獻資料價值凸現，爲牟取暴利，社會上出現了偽本，於是便有了如何鑒別版

本真偽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評估版本文物價值的需要，人們開始研究、探討如何鑒別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

關於作偽，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中作了生動描述：

近時作假宋板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板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扇方簾棉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槌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徵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粧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烟薰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迹；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綫燒紅鎚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信者；或札夥囿，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瞞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

此外，高氏書中又對宋、元本及修補本的特徵有所揭示：

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涇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綫，紙松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又若宋板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為宋刻；元板遺至國初，或國初補欠，人亦執為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別矣。

在高濂前後，從鑒別版本出發對宋、元本特徵進行探索的尚有王世貞、屠隆、謝肇淛等人，他們根據各自經驗，對宋、元本的版式、行款、字體、紙張乃至校刻書的質量一一作了悉心研究與較詳細的記載。而在如何區分

版本優劣，尤其是如何評估版本文物價值的問題上，胡應麟在所著《經籍會通》中有一段可說是代表當時版本學界共識的論述：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為差。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吳、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為差。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版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為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于用，或用而不適于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于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過，過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過也。

應當說，高濂、胡應麟等人從客觀實際需要出發，對鑒定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所作的研究，不僅起到啓發後來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標誌着古籍版本學開始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

如果說清代版本學在明代基礎上有所發展，乃至成爲『顯學』，根本在於使鑒別版本真偽、區分版本優劣這一版本學的主要功用發揮得更充分、更具體。首先，清代注重研究版本的成果借助目錄予以反映，並形成風氣，

出現了以《讀書敏求記》、《天祿琳琅書目》、《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類型、特點各異的版本目錄。其次，衆多學者潛心投入對大量版本個案的研究，除鑒別其真偽外，在考訂版本源流上也下了極大的功夫，寫下了成千上萬篇題跋、劄記，這既是受到考據風氣的影響，亦是出於當時大規模整理古籍的實際需要。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黃丕烈，其他還有鮑廷博、吳騫、張金吾等。洪亮吉將藏書家分為五等，黃丕烈被列入第四等賞鑒家一類，於是有人即認為黃丕烈的學問不如顧廣圻，乃至簡單地稱之為「佞宋」。其實這種比較是不科學的，他們做的是不同的學問，黃是版本學家，顧是校勘學家。客觀而言，黃丕烈對上千種版本所作的精審鑒別考訂工作是前人與同時代人所不及的，後人推崇『黃跋』絕非盲目。第三，清代學者很注意對鑒別版本的內容與方法不斷加以總結並有所發明，同時對如何評估版本價值有了全新認識。如孫從添的《藏書紀要》，即對鑒別考訂版本從何處入手，如何根據版本形制與文字特徵進行鑒定等有着詳細明晰的歸納與描述，同時還從校勘準確、刻印精美、舊刻秘鈔諸角度提出了屬於版本學範疇的善本標準，這些都對後來治版本學者有着直接的影響。此外如江標的《宋元本行格表》，無疑是鑒別宋、元版方法上的創意，它在版本學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忽視的。

在此，有必要着重評價清末楊守敬所編刻的《留真譜》，這不僅因為該書對後來版本圖錄的編纂起着重要影響，還因為以《留真譜》為代表的版本圖錄在版本學上的地位遠未被人們充分認識。

## 二、從《留真譜》看版本圖錄的價值

鑒別版本是一項實踐性、經驗性很强的技術工作，離開實踐與經驗而企望靠讀幾本書在鑒別版本方面成為行



家裏手，那是不可能也是絕對靠不住的。有比較才有鑒別，這是至理名言。只有通過實踐比較，方能取得鑒別版本的經驗，方能談得上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上昇為具有切實能指導實踐的理論。前輩專家們所說的『觀風望氣』，實際就是對無數不同版本反復比較後獲得的經驗。從事過版本鑒定的行家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某些場合鑒別版本，往往沒有寬綽的時間與豐富的參考資料來作從容細緻的考證，若能賴『觀風望氣』判別版本真贋與價值，是真本事。然而，要做到能『觀風望氣』並不容易，因為其基本前提就是要多看、多比較，但即使人們在主觀上有這種意願，在客觀上却未必有這種條件，即使是能接觸到大量版本的大藏書家或公家圖書館工作人員，其見識亦終有局限。因此，盡管清代以來治版本學者將鑒別版本之術說得頭頭是道，楊守敬并未盲從，而是另闢蹊徑，創編《留真譜》一書，結果使整個版本學界耳目為之一新。他在序中說道：

著錄家於舊刻書多標明行格，以為證驗。然古刻不常見，見之者或未及卒考，仍不能了然無疑。余於日本醫士森立之處見其所摹古書數鉅冊，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關考驗者。使見者如遵真本面目，顏之曰『留真譜』，本《河間獻王傳》語也。余愛不忍釋手。立之以余好之篤也，舉以為贈。顧其所摹多古鈔本，於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補之。又交其國文部書記官岩谷修與博物館局長町田久成，得見其楓山官庫、淺草文庫之藏，又時時於其收藏家傳錄秘本，遂得廿餘冊，即於其國鳩工刻之，以費重，僅成三冊而止。歸後擬續成之，而工人不習古刻格意，久之始稍有解，乃增入百餘翻，友朋見之者多歎賞，囑竟其功，至本年春共得八冊，略為分類印行。觀者不以為嫌，當并所集之廿餘冊賡續刻之。

綜合楊氏此書本身、編纂此書的經過及自序等加以分析，我們大致可領略到：

第一，編纂此書的目的就是直接向人們提供難以見到的古鈔本及宋、元舊刻書影面目，以資版本的比較鑒別，這種鑒定版本的手段比各家僅賴文字著錄更直截了當，因而更具有實用價值。如從版本學的整體角度去認識，《留真譜》的價值尚不僅僅在於此。學術界為什麼認為金石學在宋代已成立？是因為構成宋代金石學的不僅有專門目錄，有文字考釋，有流傳真偽的考訂，更有圖譜（如《考古圖》、《嘯堂集古錄》、《宣和博古圖》之類）。圖譜或許有供藝術欣賞的一面，但主要是用於鑒別，而且圖譜既列目錄，亦兼考訂，其於鑒別金石的作用要比一般的目錄與考訂文字來得更大。因此，圖譜是金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缺少圖譜，金石學是不完整的（《四庫》將《考古圖》等列入譜錄類是頗為荒謬的）。同樣，楊氏《留真譜》亦具有版本目錄的功能，並撰寫了十九篇考訂提要，它在如何充分發揮版本學的主要功用方面又朝前推進了一大步。可以說，《留真譜》的出現，意味着鑒別版本從間接的著錄版式行款時代進入了直接的圖錄（書影）時代，意義甚偉。因此，以《留真譜》為代表的版本圖錄，理所當然是古籍版本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留真譜》的直接發明者並非楊守敬，而是日本版本學家森立之等一批學者。除了楊氏自序外，我們從陳捷小姐整理的《楊守敬與官島誠一郎的筆談錄》一文中了解到楊氏還在日本購得小島尚質所編《留真譜》底稿。可見對版本圖錄的重視及『留真』名詞的使用，在當時日本的版本學界不限於一家。不過，日本學者終未將《留真譜》刻印成書，而是由楊守敬予以完成，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其實，版本圖錄的產生有

其歷史必然性，隨着版本學的發展，人們終究會認識到鑒別版本用『按圖索驥』的方法要比單純的文字說明來得高明、實用，何況始於明代中期的影刻本、明末清初毛晉與錢曾的影鈔本以及早就流傳的金石圖譜等，早晚會對人們有所啓示。當然，誰最先推行的功績應予肯定。

第三，楊氏刻《留真譜》十分不易，其自序只談到兩條，一是經費的匱乏，一是刻工難達要求。其實，最難的還是底本的蒐集，其序中雖未談及，但《楊守敬與官島誠一郎的筆談錄》多處記載着楊氏為尋覓佳槧底本而近乎向對方哀乞的場面。在當時的年代和環境下，通懷樂善者畢竟不多，日本如此，中國何尚不是這樣。或許，這也是版本圖錄出現較晚並且未能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顧廷龍、潘景鄭兩先生在三十年代即想編稿鈔校本圖錄，並就所得已攝製了數十幅圖版。六十年後，面對泛黃的照片，予曾問顧師為何未能成編，曰名家之作品缺乏（如無明吳氏叢書堂鈔本、楊氏七檜山房鈔本等），沒有代表性。又詢潘師原委，曰嘉業堂、鐵琴銅劍樓等藏家均拒絕借用。因明刻本較易找尋，故率先編成《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由此更加體會到楊守敬纂刻《留真譜》的艱難。如果我們再將他在日本孜孜以求的訪書並最終助黎庶昌校刻《古逸叢書》聯繫起來認識，則其執著的治學精神及為傳播民族文化所作的貢獻遠非就事論事地評價《留真譜》所能涵蓋。因而在今天，無論從那方面講，我們都應在版本圖錄領域有所發展，有所貢獻。

### 三、編纂稿鈔校本圖錄的意義

在《留真譜》問世後至今近一個世紀中，相繼出現了一批版本圖錄，其中反映一家所藏的有《鐵琴銅劍樓宋

《金元本書影》，以斷代為主題的有《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以通史體裁編纂的有《中國版刻圖錄》，各具特色，並先後採用了石印、影印的先進手段，使畫面更為「留真」，與楊氏模刻之法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形態較刊本更為原始的稿本、鈔本與大量產生於明、清以來的批校本却一直未有專編，缺乏系統的經驗總結，使版本鑒別在這些方面的比對資料相當稀少（上海圖書館曾在一九七八年編印過一冊《善本書影》，顧廷龍先生特地選了若干種稿、鈔、校本以供當時參加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青年工作者參稽，但由於該書所收品種既少，且採取掃描油印方式，質量較差，又未正式出版，故影響不大）。其實，無論從古籍版本流傳的數量、價值抑或鑒定版本角度上講，編纂稿鈔校本圖錄皆很有必要。

我們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稿、鈔、校（包括批評、注釋）本的數量作了統計。在經部的五千二百三十九種版本中，有稿本六百五十九種、鈔本一千二百零九種、校本一千零二種，在史部的一萬五千七百零八種版本中，有稿本一千六百十六種、鈔本五千三百八十三種、校本一千六百八十七種，在子部的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種版本中，有稿本六百六十六種、鈔本三千五百五十九種、校本一千三百六十二種，在集部的二萬二千九百二十四種版本中，有稿本一千九百零六種、鈔本六千九百七十種、校本二千八百十三種，在叢部的六百二十二種版本中，有稿本一百零八種、鈔本九十一種、校本五十一種。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七種版本中，稿、鈔、校本即占了二萬九千零八十七種，比例達百分之五十一強。由於目前尚無簡便的檢索途徑，對這個看似簡單的統計，我們花費了不少時間與精力，目的是想說明，面對如此大量而有價值的稿鈔校本（據我

們所知，各地公私收藏單位中，還有大量未入善本書目，甚至還有待整理鑒定的稿鈔校本，版本學界沒有理由回避、輕視對它們的研究。在人們長期熱衷於雕版印本研究的情況下，對稿鈔校本的研究不僅是讀者的需要，也是版本學發展的需要。

稿本是書籍版本的最初形式，從整體上說是一書不同版本的祖本。雖然稿本有手稿、清稿等區別，但即使有修改也大多出自作者本人之手，無傳鈔、翻刻之誤，因而最爲可信。未經鈔寫、刻印的稿本最爲珍貴，無論形式與內容皆堪稱海內孤本。即使已經傳鈔與刻印的稿本，同樣值得寶貴，這是因爲稿本的鈎乙增刪之處，刻本往往不得而見，惟閱原稿，方可識作者著書爲學之歷程。如清沈大成《學福齋詩文集》稿本，載有《項貢甫畫梅短歌》一首：『我聞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縑索畫直。豈知皆出兄手中，可憐贗鼎無人識。』沈氏自注曰：『金壽門在日，常倩兄畫梅而自署其上。』潘景鄭先生得此本後題跋其上云：『今集中此詩已刪去。世珍冬心畫梅，而不知都出項氏之手，是亦可添藝林故實矣。先生刪而不存，蓋篤於友誼而諱之也。稿本之足貴，即此一端可見矣。』此其一。其二，一書雖已鈔寫或刻印流傳，但作者又作修改整理，則可補通行鈔本或印本之未備。如本書所收清臧庸《韓詩遺說》稿本，傳世鈔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舊稿。嘉慶己巳臧氏重加校訂，寫貽朱爲弼，則此稿要比他本精確完備。至於章太炎在《虜書》刊刻之後的幾份修訂手稿，更是研究章太炎思想的重要資料。其三，稿本可糾正刻本之外誤。如清沈欽韓《兩漢書疏證》，雖有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但錯得離奇，竟把《後漢書》中缺卷，謬以《藝文志》屬入。而《兩漢書疏證》的稿本今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若匯集整理出版，則

浙江書局本可以廢置。其四，某些內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以補充。所謂印本未收，並非指著者自己刪削，而是事出有因，刻印者未收。如清林則徐《粵海即事詩》稿本錄詩十八首，作於鴉片戰爭時期琦善所主和局失敗廣州被圍時，編《雲左山房詩鈔》者恐觸時忌，未予收錄，則後來重輯林氏詩集者可據此稿補入。又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出於曾國藩刪定，以資料可靠程度而言，自然以原稿為佳，然以原稿與刻印本比勘，亦可獲得不少可供研究的綫索。

鈔本是稿本或刻印本的復寫本。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圖書主要靠鈔寫本流傳。由于歷史原因，唐五代以前的鈔寫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鳳。諸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律藏初分》（鈔於西涼建初年間）、上海圖書館所藏《維摩詰經》（鈔於北魏神龜元年）、故宮博物院所藏唐吳彩鸞寫本《刊謬補缺切韻》等，藏家無不視為鎮庫之寶。即使雕版印刷流行之後，鈔本仍與刻本並存不廢，其原因有各種，有的是限於條件無法刻印，只能依賴傳鈔，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類的大書，部頭太大，即使皇家亦沒有力量刊刻，只能鈔寫；有的書出於特殊需要編纂，如帝王實錄及出於個人治學所用的節本、匯編本，只要鈔寫就足敷應用；已有刊本的一般性圖書，若一時覓不到刊印本，喜好者亦往往鈔寫錄副；還有就是純粹出於愛好玩賞或其他目的而繕寫的精鈔本。由此可見，在印刷術已經流行的時代，鈔本的並行流傳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刊本的不足。後世藏書家之重視鈔本，亦仍然離不開版本的兩重性，其一是它的文獻價值，若刻本亡佚，可賴鈔本以存原貌，如宋本《類篇》久佚，毛氏的影宋鈔本可延一綫之脉；出於不同流傳系統的鈔本，可補刻本之未備，如宋王闢之的《澠水燕譚錄》，明商

濬刻《稗海》本僅錄二百八十五條，闕失或刪節殊甚，而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柳僉鈔本則有三百餘條，與晁氏《郡齋讀書志》記載條數相近。其二是由於鈔本的文物價值，鈔本的流傳總比印本少，則物以稀為貴，出於名家鈔寫的書法手迹輔以精妙紙墨又不啻藝術珍品（毛氏汲古閣鈔本勝於刻本，除了其刻本校勘粗疏而影鈔本則保留了宋、元本的真面貌外，鈔寫精美亦是重要原因），還有些鈔本則因人而貴成為珍稀的歷史文物。

批校本是指稿本、鈔本或印本在流傳過程中經收藏者、閱讀者手書其批點、評注、校勘文字的本子。批校本的版本價值主要在於批校文字而不是被批校版本本身。批點、評注是批評者的讀書心得，每於後人治學有所啓迪，且往往有未經整理刻印者，可作稿本觀。如何焯批校《唐音戊籤》，用功八年，或抒己見，或採摭前人與同時人之說進行評議，硃墨燦爛，而《義門讀書記》未及收錄。又如齊召南批《杜工部集》，其讀杜心得可資從事文學批評、研治杜詩者參考，也未刊刻入集。而通過不同本子的校勘，校語寫於天地之間，既為讀者提供一個文字較為準確的本子，又可從中了解不同本子的面貌與相互間的關聯，這又是校本的價值所在。如丁杰校清鈔本《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多方篇》，此篇久佚，劉臺拱等人先後所鈔與《四庫》本皆出自《永樂大典》，但有舊鈔誤者，有新鈔誤者，更有林氏自誤者，丁氏予以反復校訂，辨析毫芒。此外，名家批校本因批校者的學問高人一籌而倍受重視，相應地其手迹也受到人們的珍愛，因而更具文物價值。至於過錄批校本，也不能輕視，常有名家過錄他人批校的情形；在原來的批校本亡佚或難得的情況下，過錄批校本的價值幾乎與原本相埒。而本書所收汪由敦過錄其師何焯批校本《文選》，雖《義門讀書記》已收，但文字有異同，入《讀書記》者或經何

氏修改，或何氏另有一校本，那麼汪氏過錄之本也有其自身價值，不僅在於保留汪氏墨迹也。

鑒定稿鈔校本要比鑒定刻本的難度大。首先是因爲，稿鈔校本大都是孤本，且往往深藏於擁有者的篋中，公私書目中較少著錄，對於它的鑒定很少有可能像鑒定刻本那樣有較多的參證與文字記載資料。爲數較多的題跋割記，散見各處，而附着於稿鈔校本的跋語，本身還有一個真偽鑒定的問題。復次，稿鈔校本風格變異的程度，要比刻本來得大，從中總結規律性的現象也更不容易。其二，稿鈔校本相互之間亦有一些不易分清的界限，例如編著者請人鈔寫騰清的清稿本，若無原編著者的標記手迹，很容易與鈔本混淆；純粹過錄他人批校語的本子，形式上像批校本，而實質上只是鈔本。至於名頭不大的原本亡逸之後，據其傳鈔之本也很容易被認定爲稿本。稿鈔校本鑒定的要點在於確定係出于何時代、何人之手，以及它的性質與價值，後者主要通過校勘的手段，而前者必須依仗字迹比對。盡管稿鈔校本的鑒定也可以像鑒定刻本那樣，通過紙張、諱字、印記等因素識別，甚至從字體特徵上大致亦可區別各時代的風格，但要斷定出自那位名家手筆的稿鈔校本，倘若沒有字迹比對，是很難把握的（上海圖書館過去就有過因沒有仔細辨認字迹而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本、黃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集》等混同於普通古籍的現象）。顧廷龍先生在教授我們學習版本鑒定時多次告誡道，鑒別版本以稿鈔校本爲最難，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時又要練習書法，以熟悉各時代的書法風氣。並說他自己所以習書唐以前寫經之體，就是爲了鑒定現存各時代手寫經卷的需要。他又在《中國古代的鈔校稿本》一文中強調：「鑒別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筆迹，繼而是印記、紙張與其他因素。沒有字迹比對，即使是精於版本鑒定的前輩也容易失誤，不用說初學了。」



由於鑒定稿鈔校本要比鑒定刻本在更大程度上依賴經驗的積累，因此，要促進版本學界在這方面有所提高，進一步發掘公私藏書中尚未被認識或鑒定有偏差的善本，編纂一本較為系統、全面的稿鈔校本圖錄，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 四、本書編纂始末

本書的編纂是顧廷龍先生在一九九五年提出的，在主持長達近二十年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告歲後，他想到有生之年完成宿願。為此，他與徐小蠻女士專門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古代的鈔校稿本》一文，提出編纂此書的建議，並囑咐我為此事多做些具體工作。幸運的是，那年十月，上海圖書館與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合併，新館所領導對編纂稿鈔校本圖錄予以鼎力支持。於是，我一邊積極做準備工作（包括草擬編纂計劃，初選收入品種，配置必須設備材料等），一邊又在《圖書館雜誌》上發表《亦談編纂鈔校稿本圖錄》一文，為使該項目能順利進行再造輿論。然而，由於上圖新館建成，須馬上搬遷，編纂工作只得停止。時顧老從北京來電再三叮嚀，『搬遷工作是頭等大事，不容半點疏忽，其他皆可不予顧及』。直至一九九八年五月，百數十萬冊古籍安全搬入新館並全面對讀者開放，我們纔得以正式開始編纂工作。孰料六月下旬顧廷龍先生因患結腸癌住院，越兩月竟遽歸道山，終未能親自主持該項工作，諸同仁為之痛惜不已。為了完成顧廷龍先生的遺願，我們沒有放棄這件有意義的工作。但隨着實質性編纂工作的深入，問題接踵而至，始知編纂此書甚為不易。